

慧命继天下绝学 修辞存博大真我

——评《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戴 路

段德智教授选编的《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是对陈修斋先生的最好悼念!陈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莱布尼茨哲学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出版了大量的专著、译著,还写作哲学论文70多篇。选编者围绕着哲学观与哲学史观、近代西欧唯理论派和经验论派哲学研究、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中西哲学对话这四个主题,遵循“能够反映陈先生研究、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这一原则,从这70多篇论文中精心筛选出45篇(其中包括陈先生生前未公开发表的11篇),收入本论文集。这部论文集不仅记载着陈先生在选定哲学道路后,即以全部精力投入紧张、艰苦的哲学思索与哲学创作,始终不懈地向着设定的远大学术目标奋进、拼搏,一步步逼近和走入哲学这个神圣殿堂的足迹,而且凝结了这位著名学者的智慧、卓识和宏论,是他在哲学和哲学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陈先生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中心始终集中于近代西欧唯理论派和经验论派哲学,而尤其致力于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同时他还广泛地涉猎了许多领域。本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他在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近代西欧唯理论派和经验论派哲学研究、莱布尼茨哲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西哲学对话诸领域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但限于篇幅,这里难以作出系统的介绍,读者自可去细读、领悟。然而,我以为从这本论文集中可以获得更大教益的,则是陈先生在学术领域中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因而,从这本论文集中,我们不仅要学习陈先生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更要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为学精神。

首先,在学术领域中,陈先生敢于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如何辩证地对待唯心主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围绕这一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界曾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波。收入本论文集的三篇关于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和估价唯心主义的文章,都是1956年春至1957年春期间写出来的。我们知道,当时苏联的教条主义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十分严重,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在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界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被奉若神明。陈先生与贺麟等学人对学术界的这种状况极为不满,提出要正确对待和估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向教条主义提出了挑战。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从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时起,陈先生在学术上就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甚至带来厄运的情况下,也没有动摇过他的信念。在整个论文集里,随处都可以看出他对教条主义的厌恶。事实上,陈先生所研究的唯理论派中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去辩证地对待唯心主义的话,他又如何能在唯理论派哲学和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呢?所以,在学术领域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才能不断地攀登理论高峰。而陈先生在同学术领域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和治学品

德，正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

其次，陈先生十分注重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在学术上不断开拓进取。在陈先生看来，没有一个科学的哲学史方法论，是不可能构建出一个科学的哲学史体系的，是不可能西方哲学史领域中作出重大建树的。因此，他一贯坚持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文章，并于1984年与萧萐父教授共同主编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收入本论文集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弁言》特别强调了哲学史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则，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体系，它必然要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史本身的研究和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正是遵循着正确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几十年来，陈先生在学术上从不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果，而是不间断地进行着艰苦的自我超越，向着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不断地攀登。就以他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研究来说吧，1980年，他发表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的几个问题》，对近代西欧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探讨。5年后，即1985年，他又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立问题的再思考》，对许多重大问题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对自己原有的某些观点又作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再如，陈先生在长期潜心研究莱布尼茨哲学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于1981年发表了《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体系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探讨，对莱布尼茨哲学作出了评价。1986年和1988年，他又先后发表了《莱布尼茨论人的个体性和自由》及《莱布尼茨对主体性原则的贡献》两篇论文，探讨了莱布尼茨的“人学”观点，对莱布尼茨哲学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陈先生在学术领域中就是这样地思考再思考，研究再研究，不断地用新材料来丰富和补充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把我国对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及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然而，这位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并为国内学术界公认的西方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莱布尼茨哲学的专家，并没有就此止步，直到晚年，他还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标准和目标》（1991年）一文中提出，“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才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应有的目标。这充分表达了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决心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胸襟和胆略，对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期望。

其三，在陈先生看来，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打破封闭的状态，面向世界，才有出路。陈先生的学术重心虽然放在近代西方哲学方面，但他从不独立地、封闭式地就近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近代西方哲学。他不仅学贯古今，十分注重从近代哲学同当代哲学的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近代西方哲学，十分注重用当代哲学意识来审视近代西方哲学，十分注重揭示和阐释近代西方哲学同当代哲学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论述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文章（本论文集中收入6篇），而且特别注重中西哲学的关系，积极主张中西哲学之间进行对话。在陈先生看来，哲学不是狭隘的宗派，而是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并且他对哲学的这种世界意义坚信不移。正因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1977年，就写了《应该给予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一文，多方面地强调了研究欧洲哲学史的重要性，发出了“应该给予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的呼吁。此后，他又针对社会上和学术界仍有人在我国已经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对引进西方哲学心存疑惧的倾向，发表了《要对西方的某些观念进行再认识》（1988年）、《谈谈对西方哲学的引进》（1990年）等文章，阐述了“引进”同“吸收”的区别，并提出，中国哲学如果“再回到以往的封闭状态中去，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的水平，走到世界的前列。陈先生的这些见解是明智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这本论文集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以及蕴含于其中的陈先生的可贵的治学精神，远非上述这些文字所能表达。他留给我们的这些思想和精神财富，必将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